

大學人文

夏中义 丁东 主编

农村与城市

——中国知识分子到农村去——运动的回顾与思考
梅贻琦怎样当清华校长

蔡元培怎样当北大校长

什么是“北大精神”

大学品格：在精英与大众之间

我的道德底线是不说谎

——为东南大学百年校庆院所作的演讲

现代中国的“双城记”——城市季风——再版引言

大跃进成的一代

林氏家范

——中国士大夫传统现代转化二考

“新青年”——一个新的起点——《中国思想史》卷二之一章

《美国想像》的历史意义

——梁启超与梁漱溟发论梁运动功过之争

北大讲义回顾 新稿

《大学新讲文》——梁启超山金汲英集

接读 大学人文

一个女大学生的四封书信

关于人文精神的几点想法

我仍想做个平凡人——重新认识自我

胡适河畔的文化精英

幸福就是

听朱东润先生讲课

爱恨故事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3辑

大學人文

清園王元化



第 3 輯

DAXUE RENWEN

夏中义 丁 东 主 编
谢 泳 邵 建 副主编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学人文. 第3辑 / 夏中义, 丁东主编.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8

ISBN 7-5633-5541-3

I. 大… II. ①夏…②丁… III. 人文科学—高等学校—课外读物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88867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 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日报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八桂路 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开本: 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张: 13.5 字数: 250 千字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 ~ 5 000 册 定价: 2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Contents

[独立评论]

- 2 **钱理群** · 农村与我们
 ——中国知识分子“到农村去”运动的回顾与思考
- 22 **智效民** · 梅贻琦怎样当清华校长
- 32 **雷 颐** · 蔡元培怎样当北大校长
- 42 **胡 军** · 什么是北大精神
- 47 **刘铁芳** · 大学品格：在精英与大众之间

[知识生活]

- 56 **沙叶新** · 我的道德底线是不说谎
 ——为东南大学百年校庆所作的演讲
- 61 **杨东平** · 现代中国的“双城记”
 ——《城市季风》再版引言
- 70 **王 康** · 大器晚成的一代

[沉 钟]

- 74 **林同奇** · 林氏家风
 ——中国士大夫传统现代转化一瞥

- 101 **李新宇** · 《新青年》：一个新的起点
——《叩问陈独秀》之一章
- 120 **李 刚** · “美国想像”的历史重构
——1950 年南京反诽谤运动历史考论
- 132 **张耀杰** · “北大讲义风潮”新解

[观 察]

- 146 **张蕴艳** · 《大学新语文》编委岱山会议实录
- 158 **徐 方** · 我讲“大学人文”

[新青年]

- 164 **金 莹** · 一个大四女生的四封旧信
- 170 **徐元婧** · 关于人文精神的几点想法
- 173 **兰阳春** · 我仍想做个平凡人
——重新认识自我

[我的大学]

- 178 **张 阔** · 丽娃河畔的文化幽灵

[读本新选]

- 196 **龙应台** · 幸福就是……
- 198 **刘海军** · 听束星北先生讲课
- 206 **欣 林** · 爱城故事
- 210 编后语暨稿约

农村与我们

——中国知识分子“到农村去”运动的回顾与思考

■ 钱理群

这是2004年11月14日我在北京师范大学“西部阳光活动”沙龙的一个讲话。

(一)

也许因为我是研究现代文学史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的，有一种职业性的历史感，一看到诸位，我就觉得似曾相识。你们的言谈，说话的姿势，眼睛里流露出的热情、困惑，你们的快乐与苦恼，初到农村时的惊喜，第一次走进农民的小屋不知如何交谈的窘态，工作深入不下去时的焦虑，以及无休止的争论，平静下来后的思考与自我质疑，等等，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上都曾出现过，而且这其中也有我的身影。这里存在着一个代代相传的精神谱系，存在着一个持续了一个世纪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到农村去，到民间去”的运动。也许你们并没有意识到，你们的“西部阳光活动”实际上正是这样一个历史运动的一个环节，一个新的篇章，你们是沿着前辈所开辟的道路往前走，你们正在继续书写和创造新的历史。

我们来作一点历史的回顾。还是从五四说起，那是现代知识分子精神的一个源头。大家知道，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核心是“人的觉醒与解放”。我要补充的是，这样的“人的觉醒与解放”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妇女、儿童，特别是农民的独立价值的被发现与被充分肯定。这三种人都处于社会结构的最底层，在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中是被忽略的存在，因此，这三大发现充分地显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主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特质，具有特殊的意义。今天要说的是“农民的发现”。鲁迅曾有一个追述，他说：“我生长于都市的大家庭里，从小就着古书和师

傅的教训,所以也看得劳苦大众和花鸟一样。有时感到上流社会的虚伪和腐败时,我还羡慕他们的安乐。但我母亲的母家是在农村,使我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痛苦,和花鸟并不一样了。”这至少说明,五四的先驱者已经认识到,农民,底层的人民,他们不是供观赏、践踏的“花草”,而是有自己的价值和独立要求的“人”,他们应该享有自己的幸福,有权发出自己的声音,维护自己的利益。

另一些思想家则把农民的解放与整个民族的解放、发展联系起来,李大钊当时就写了一篇《青年与农村》,指出:“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他进而提出:“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于是,他发出了“我们青年应该到农村去”的号召。特别有意思的是,他讲了三条理由。一是“中国农村的黑暗,算是达于极点”。他具体地列了许多方面,可见他是做了一些调查的,以至我们今天读来觉得似乎还有点现实针对性,这是很可悲的。不过今天不谈这个,我们注意的是他由此得出的结论。他说:“一般知识阶级的青年跑在都市上,求得一知半解,就专想在都市上活动,都不愿回到田园;专想在官僚中讨生活,却不愿再去工作。久而久之,青年常在城市里鬼混,都成了鬼蜮。农村绝不见知识阶级的足迹,也就成了地狱。把那清新雅洁的田园生活,都埋在黑暗的地狱里面,这不就是我们这些怠惰青年的责任,那个的责任?”

李大钊讲的第二个理由更值得注意。他说,现在大家都在讲推行“民主政治”的关键是要“立宪”,但不要忘了,中国的选民“大多数都在农村”,如果农村没有开发,农民没有觉悟,没有自由的判断力,如果真的实行普选,那些“练习了许多的诡诈的手段”的城市流氓,那些“积下了许多的罪孽金钱”的城市强盗,就会来骗“他乡里的父老”,如果把这些人选上了,“立宪政治、民主政治,哪有丝毫的希望”。李大钊因此而大声疾呼:“立宪的青年呵!你们若想得个立宪的政治,你们先要有个立宪的民间;你们若想有个立宪的民间,你们先要把黑暗在农村变成光明的农村,把那专制的农村变成立宪的农村”,“这样的民主主义,才算有了根底,有了泉源。这样的农村,才算是培养民主主义的沃土,在这方面活动的青年才算是栽植民主主义的工人”。——你们看,李大钊说得得多好,他简直就在和我们面对面地谈话,讲着当下中国已经或将要面临的问题。

我们再来看第三条理由。他说,现在许多青年,天天在城市里漂泊,找不到出路,“农村中很有青年活动的余地,并且有青年活动的需要,却不见有青年的踪影”,在他看来,这是一种“自误”。因此,他号召:“在城市里漂泊的青年朋友呵!你们要晓得,城市上有许多罪恶,乡村里有许多幸福。……城市上的生活,几乎是鬼的生活,乡村中的活动,全是人的活动;都市的空气污浊,乡村的空气清洁。

你们为何不赶紧收拾行装,清结旅债,还归你们的乡土?”——李大钊这番话可能与大家的感受不大一样,因为在许多年轻人看来,城市还有很大的发展余地,还是令人向往的;但城市的人满为患,大概也会是迟早发生的事。更重要的是,李大钊在这里显然将农村理想化了。其实,他在前面已经谈到了“农村的黑暗”,他对农村的着意美化,是出于对现代都市文明的反感,也是受到了俄国民粹派的影响。李大钊这篇《青年与农村》一开头就谈到了俄国的“青年志士”即民粹派“到民间去”的运动,他们“把自己家庭的幸福全抛弃了,不惮跋涉艰难的辛苦,都跑到乡下的农村里去,宣传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道理”。俄国“民粹派”对中国的“到民间去”运动有积极的影响,但也有消极的一面,这就是对农村与农民的理想化。

李大钊对农村与农民的理想化,还反映了五四时期另一个重要思潮,即所谓“新村运动”。“新村运动”是一个建立乌托邦理想社会、理想生活的实验,一群理想主义者聚集在一起,通常是在农村建造一所“新村”,实行财产公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共同过着一种一边读书、讨论,一边从事农业、手工业劳动的新生活。大概在1918年,日本著名作家、思想家武者小路实笃在日本九州日向就建立了这样的新村。1919年周作人去参观后,就在国内大肆鼓吹,得到了包括李大钊在内的五四新文化先驱和许多青年学生的响应,在北京组织了类似“新村”的工读互助团。毛泽东也是“新村运动”的热心者,他曾为此专门访问过周作人,还亲自起草了建设新村的计划书。“新村运动”的理想的核心理念,用周作人的话来说,就是要实现健全的“人的生活”;而所谓健全的“人的生活”,就是个体的个人与人类、社会的人的统一,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统一,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统一,人与人之间的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正是在这样的理想之光的照耀下,农民沐浴在大自然的阳光下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的生活,就对当时沉湎于空想社会主义理想中的李大钊这一代人以及青年产生了特殊的吸引力。

但应该说,在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到民间去”,基本上还停留在理论的倡导与小规模的实验上,并没有形成实际运动。真正的“到农村去,到民间去”运动的大力发展,是在20世纪30年代。如果说五四还限于思想、文化运动的范围,那么到30年代就发展为一种社会运动。在大革命失败以后,随着对中国社会认识的深化,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农村,认识到中国的根本改造必须从农村开始。但在如何实现中国农村改造的问题上出现了重大分歧,形成了两种思路。也就是说,都是“到农村去,到民间去”,却有两条不同的路向。

一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他们认为,中国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一个社会制度问题,必须通过革命,先夺取政权,从根本上改变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才有可能进行新的建设;农村问题的根本是土地制度问题,农村的变革必须从土地改革入手,改变少数地主占有大量土地,而大多数农民则无地

或少地的状况；而中国的革命又必须以广大农村为根据地，以农村的变革为全国变革的基础。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南方的江西、福建、湖南、湖北等地发动了“苏维埃运动”，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发动革命，建立根据地，出现了毛泽东诗词里所描写的“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革命景象。

与此同时，以晏阳初、梁漱溟为代表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则在大力推行“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是“愚、穷、弱、私”四个字，因此，需要进行四大教育。一是“文艺教育”，设立实验性的平民学校、艺术学校，扫除青年文盲，并进一步将平民学校的学生组织起来，成立同学会，使这些优秀的农村青年成为农村建设的中心分子。二是“生计教育”，普及农业科技，发展农业生产；在农村经济方面，帮助农民组织合作社、自助社，同时注意农村工业的发展。三是“卫生教育”，重点是建立乡村保健制度，“使农民在他们的经济状况之下，有得到科学治疗的机会，能保持他们最低限度的健康”。四是“公民教育”，“用家庭方式的教育，在家庭每个分子里，施以公民道德的训练”，“使他们有公共心、团结力，有最低限度的公民常识、政治道德，以建立地方自治的基础”。他强调，这四大教育的核心是对农民进行“知识力、生产力、保健力和团结力”的培养，说到底，是对人的教育与改造，而“从事‘人的改造’的教育工作”，才是“解决中国整个社会问题的根本关键”。为了实现这样的理念，他提出了“博士下乡”的口号，带领一批年轻人在河北定县等地进行了将近十年的农村改革实验。梁漱溟也是“乡村建设运动”的大力推动者，但他认为，中国的农村问题并不是“愚、贫、弱、私”这些具体问题，而是要抓住根本，着眼于整个中国问题的解决。而中国问题的关键，是要以中国固有文化为基础，吸收西方先进技术，重建民族新文化。具体到乡村建设，他主张以中国传统的乡约形式重建中国新的礼俗，并在农村大办村学和乡学，使之不仅成为地方教育机构，而且从中分化出乡村基层政权组织与民间团体，把农民组织起来；同时，建立生产、销售、运输合作社和农民银行等生产、金融组织，推动农村技术进步，走一条以农业引发工业的道路。梁漱溟也带领了一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建立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并开辟了邹平、菏泽、济宁等实验区。在20世纪30年代，“乡村建设运动”得到蓬勃发展，据国民政府实业部统计，1934年全国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团体达600多个，建立的实验点、实验区有1000余处。后来，这些实验都因抗日战争爆发，实验区为日本侵略军占领而告终。

在20世纪40年代，在全民族的大流亡中，大批知识分子从城市走向穷乡僻壤，在实际接触中加深了对中国农村问题重要性的认识。而抗日战争，某种程度上就是以农民为主体的民族解放战争，如毛泽东所说：“农民——这是中国军队的来源。士兵就是穿起军服的农民。”从这一事实出发，毛泽东引申出一系列的非常重要的论断：“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如不依靠三亿六千万农民群众的援助，他们就将一事无成”，“农民——这

是中国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值得注意的是,当毛泽东进一步呼吁“中国广大的知识分子应该觉悟到将自己和农民结合起来的必要”,以至提出“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的论断时,他是得到了知识分子的强烈认同的。人们感到,这几乎是一个无法抗拒的时代的命令,同时也是通过自身的痛苦经验而发出内心的要求——在残酷的战争中,人会产生一种孤独感,知识分子尤其容易产生软弱无力感,这时候就迫切地要求寻找归宿,中国的这块土地,以及土地上的普通农民,就自然成为战争中处于生活与精神双重流亡状态的知识分子的“皈依之乡”。于是,大批知识分子涌向以延安为中心的根据地,走向农村,出现了更大规模的知识分子“下乡”运动。这一运动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到民间去”运动自然有深刻联系,但也有不同之处。除了这是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发动的,是一个政府(当时延安边区政府可看作是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雏形)行为之外,最主要的是,在知识分子与农民的关系上发生了微妙的移动:由“启蒙/被启蒙”逐渐转换为“受教育/教育”,“到民间去”的“启蒙”主题逐渐变成了“改造”主题。特别是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章,宣布“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相比较”,“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把前面说到的美化农民与农村的“民粹主义”倾向发展到了极端。而当毛泽东进一步要求“知识分子工农化”,而“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者也”,这就实际上意味着要用农民意识来改造知识分子,以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与社会由此埋下了极大的隐患。但在40年代的根据地,尽管存在着指导思想上的某些偏差,当时的“下乡运动”所产生的主导作用还是积极的。知识分子在下乡过程中加深了对中国农民、农村以及整个中国国情的了解,同时也大大推动了农村建设事业的发展。1942年至1945年边区开展的大众教育运动,与同时开展的减租运动,互助、合作运动,大生产运动,民主选举运动互相配合,引发了边区农村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的全面变革,在40年代后期,更发动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事实上为以后的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949年后建立起来的国家体制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因此,国家的教育、文化、卫生等政策都倾向农村,这就导致了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村建设的全面发展。当然,毛泽东按照他的乌托邦的社会理想(这一理想是对五四时期“新村运动”理想的一个发展),在同时期所发动的“大跃进”与“人民公社”运动也极大地损害了农民利益。这是需要另作讨论的。我在这里对同学们讲的,是我这样的成长于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的选择。我们这一代有不少满怀激情的理想主义者,建设祖国的巨大热情和自我改造的高度自觉性,使得我们年轻时的志向是,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贡献青春。因此,农村一直是我们认为可以大显身手并能改造思想的广阔天地。当然,无可否认,这背

后还存在着另一个理念,即“党指向哪里,我们就到哪里”。因此,大学毕业时,当组织(“组织”也是那个时代最流行的概念)分配我去贵州山区时,尽管这多少有点惩罚的意味(因为我“家庭出身”不好,自己又走“白专道路”),但我仍欣然前往,因为这是党的安排,同时想的是“好男儿应当志在四方”。后来,我并没有分到农村底层,而是在专区所在地的安顺教书——一干就是18年,正是我从21岁到39岁的人生最美好的时光。但我并不后悔,因为我在中国社会底层经历了大灾荒的年代与“文革”的浩劫,说句夸张的话,我是与底层百姓一起经受磨难的,并在这一过程中对中国社会有了真正深切的了解,这几乎决定了我以后一生思想与学术的发展。老实说,我今天之所以如此关注一个世纪的知识分子“到民间去”的运动,最基本的原因就是在这18年里,我与中国的底层社会建立了血肉联系。尽管我在70年代末恢复高考后离开了贵州,来到北大这一“最高学府”,但我始终把贵州作为北大之外的另一个精神基地,一直保持着密切交往与精神联系。顺便说一下,听说许多同学现在还与你们暑期去过的农村点保持着联系,我以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不管今后你们做什么,到哪里去,都不要放弃这样的精神根据地。

现在,该说到了“文革”中知识青年那一代,也就是你们的父母那一代。他们是响应号召到农村去的。这是20世纪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运动。毛泽东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如此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这是需要专门研究的。我想,其动因是复杂的,除了缓解“文革”所积累起来的政治危机与就业问题这些现实的考虑外,或许还有毛泽东本人的类似“新村运动”那样的乌托邦理想(“文革”一开始,毛泽东就提出要把全国办成一所“大学校”,全民学工、学农,习武,批判资产阶级)。但无论如何,这场运动在指导思想上不无反智主义倾向(比如一再强调“书读得越多越蠢”,因此需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反智主义恰恰也是民粹主义的一个要害。因此,我并不主张将“上山下乡”运动理想化。但有一个事实也不宜忽视,就是当知识青年离开城市来到农村,他们的思想感情的变化。记得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引述过当年的一位知青说的一句话:我来到农村,“才知道什么叫中国,才知道我们的老百姓是多么的苦又是多么的好”。我说,这两个“才知道”非同小可,无论对知青本人,还是对未来中国的发展,都是意义重大的。因此,到了“文革”后期,知青中出现了许多后来被学者称为“民间思想村落”的群体,绝不是偶然的。一方面是“9·13”事件发生,人们对长期被灌输的思想观念产生怀疑,另一方面也是在深入农村后对“中国问题”的正视,逼得这一代人“重新思考与估价一切”,包括重新思考“中国向何处去”这样一些根本问题。应该说,正是这些思考,为“文革”结束后的“思想解放运动”与改革开放提供了时代氛围,并作了人才的准备。今天活跃在中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学术各界的许多骨干,都有知青背景或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经历,这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现象,他们在农村中所获得的各不相同的经验教

训,对他们今天的观念与行动都有重要影响,自然也会不同程度地影响中国的现实以至未来。大批知青深入穷乡僻壤,同时也引起了农村的变化,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的建设,也为以后农村的变革作了一定的准备,据我所知,“文革”结束后从农村开始的中国变革的推动者中就有当年的知青。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当年大批知青深入农村,对中国 20 世纪最后 20 年的变革产生了直接与深远的影响。

历史回顾到此就暂告一个段落。我们不难注意到两个重要的现象。一是中国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到民间去”的运动是伴随着整个 20 世纪的中国历史的,整整一个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可以说是“前赴后继”地奔赴农村,走向民间。这是为什么?另一个重要现象是,尽管知识分子每一次到农村去,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这样的影响大都是“雨过地皮湿”,于是,几乎每一代知识分子下乡,都要面对前一代人所面临的几乎相同的问题,即中国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落后与贫穷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这又是为什么?思考这两个“为什么”,我想,对我们今天重新走向农村,是有重要意义的。

(二)

这就说到了今天我想和诸位重点讨论的问题:21 世纪初,我们为什么要到农村、到民间去?这其实是你们开展“西部阳光行动”首先要想清楚的问题。与我们当年半被迫、半自觉地走向农村不同,你们有一个名称,叫作“青年志愿者”,但你们仍属于“到农村去,到民间去”谱系中的第六代(五四的先驱者是一代,30 年代的共产党人与乡村建设派是第二代,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是第三代,我们这些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是第四代,“文革”中的知识青年是第五代)。那么,作为第六代人的“青年志愿者”,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在怎样的历史驱动下,重新走向西部,走向中国广大的农村的?

作为回答,我想了两句话:“今天我们需要农村,农村需要我们。”我曾对这两句话的次序颇费斟酌:应该把哪一句放在前面?最后认定,“我们需要农村”是首要的、第一位的。为什么今天中国的大学生,中国的年轻一代中的一部分人,会觉悟到自己需要农村?在上次你们的总结汇报会上,有一个同学说了一句话,引起了我的长久思考,他说:参加这次“西部阳光行动”,“我们的生命多了一层底色”。我今天就从这“底色”说起。

在前面的历史回顾中,大家可能会注意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到农村去,到民间去”的运动,在 20 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曾中断了将近 20 年。尽管如前所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但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的主要流动方向是从农村走向城市,这其中就有大批的农村工。这时候,很少有知识分子,更不用说大学生,关注到农村。80 年代大学里的主流思潮是“个性解放”,人们更关注的是自己个人的发展。这是可以理解的。前面已经说过,我们那一代人经历了一个禁

欲主义的时代,因此,当人们作历史反思时,必然要着意地强调个人的价值与利益,强调人的欲望的合理性、合道德性与审美价值。我当时在北大讲周作人的“自然人性论”,受到学生的狂热欢迎,就是这种思潮的体现。而且我认为,这在当时是起到了从封建专制主义禁锢下解放出来的作用的。在今天,在个人价值、利益仍在很多地方被漠视的情况下,个性解放的命题并没有完全失去其意义。也就是说,80年代思想解放的成果,今天不能因为出现了另一方面的问题而轻易否定。所谓“另一方面的问题”,是指到了90年代,商业化与消费主义的盛行,导致了极端利己主义、实利主义和追求瞬间快乐的纵欲主义倾向,出现了所谓“自我中心”的一代人。这是许多人都感到忧虑的。

任何事情发展到极端,都会引起反思。在我看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当代大学生中的某些人,大概也包括在座的参加“西部阳光行动”的年轻朋友,开始重新思考: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个人”、怎样的“个性解放”?怎样才能真正实现“个人的价值”?进一步还要提出“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这样根本性的追问。于是人们开始重新考察,先驱者们所鼓吹的“个性解放”的真实含义是什么。

这里,我想向大家介绍我所熟悉的鲁迅的思想。鲁迅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个”、“己”的概念。他认为中国传统强调“类”的概念,即把人看作家庭的人、社会的人、国家的人,却恰恰忽略了“作为‘个’(个体)的人”。但鲁迅同时指出,他所说的“个”、“己”,并非“利己主义的‘己’”;他批评那种把“个人的悲欢看作是整个世界”的狭隘的个人观。他所强调的“己”,是一个博大的概念,是与世间万物、与他人相通的大生命。他有一句名言:“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就是说,整个人类,整个宇宙的生命,不仅是人的生命,而且包括大自然的生命,都与 I 有关。由此而形成一种观念:世界上还有一个人不幸福,我就是不幸福的;还有一个人不自由,我就是不自由的;还有一个人没有从被奴役的状态下解放出来,也就谈不上我个人的解放,至少说我的个性解放是不完整的。也就是说,先驱者所追求的个性解放包含着一种博爱精神,一种大悲悯、大慈悲的情怀。其实,这样的追求并不神妙,同学们这次暑假到农村去,就应该有这样的体会:当你看到广大农民有病不能治,有的还挣扎在饥饿线上,看到许多农民的孩子渴望知识的眼光,你能说你是真正幸福的吗?你能仅仅为自己有饭吃、有书读就心安理得吗?当然,这绝不是说,我们不该谋求个人的发展与利益,鲁迅说“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我们当然应该理直气壮地追求个人的生存权、温饱权与发展权;但同时,我们眼中还要有他人,“己”之外还要有他者,而这个他者与自己是密切相关的。人既是个体的存在,也是群体的存在,因此,不仅要追求个人的生存、温饱与发展,还要追求群体的生存、温饱与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人生理想、人生观。

这里,我还想向大家介绍巴金老人的人生观。巴老已经一百岁了,支撑他如此顽强地活着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他说了极其朴素的一句话:“我愿意每张嘴都

有面包，每个家都有住宅，每个小孩都受教育，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一颗炽热的心就为着这样的理想燃烧了整整一百年。这令人感动，更能给我们以启示。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你们的“西部阳光行动”也正蕴含了这样的理想与价值观。你们到农村去，自然是要寻求个人发展的更广阔的空间，是为了个体生命更健全的发展，同时，也是为了对农民，特别是对农村孩子的生存、温饱与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在谋求“每个人”、“每个小孩”、“每个家”的健全发展中实现自我价值。你们至少是用自己的行动向世人表明，中国的年轻一代并不是只为自己活着的，你们有着更为健全的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像巴金这样的老一代人的理想，正在你们的手中得到继承与发展。而从你们自身来说，通过参加“西部阳光活动”，至少可以建立一个“心中有他人”的人生理念与人生理想，以此作为生命的底色，这对自己一生的健全发展也是意义重大的。

在我看来，新一代的志愿者到农村去，还有一个全球化背景。我去年曾去贵州，和当地的大学生谈到，在全球化的中国与世界，人的生命存在有两种方式。一是“固守者”，即坚守在本土：从世界的范围，就是坚守在中国本土；从国内的范围，则是坚守在自己的家乡。一是“漂泊者”，从农村到城市，从小城市到大城市，从国内到国外，总之是远离故土，到“远方”去寻求发展。当然，“固守”与“漂泊”从来就有，但在全球化时代，全球性的流动成为越来越普遍的事实，“固守”与“漂泊”也就成为更为瞩目的生存现象。

这两者之间，具体到个人，是可以变动与转换的，也不能作价值高低的判断：“固守”与“漂泊”都有自己的价值，同时存在着各自的危机。而两者的共同问题之一就是有没有“根”的问题。“漂泊者”离开本土，其实是很难融入新的栖居地的。我和很多到国外留学的学生都谈过，你即使取得了外国国籍，由于你的出生与成长背景是在中国，文化差异是无法消弭的，在一些最深层次的生命与文化的底蕴方面，你是进不去的，你的生命的“根”还在本土。这就是为什么在国外生活了几辈子的华裔、华侨，都摆脱不了“寻根”情结的原因。但现在的问题是，在全球化背景下，许多年轻人不仅其身体远离本土，而且在精神上对本土（本土文化以及生活于本土的父老乡亲）产生了认知上的陌生感，情感、心理上的疏离感。这样，一边不能真正进入，另一边又主动疏离，这就成了悬浮的人、无根的人，这就构成了自我存在的危机。说严重点，也会造成民族文化的危机。从表面上看，“固守者”似乎不存在没有“根”的问题。其实事情并没有这样简单，你天天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并不自然就认识这块土地，甚至也会产生认知上的陌生感，情感、心理上的疏离感。我就这样问过贵州的大学生：你认识你脚下的土地吗？这就说到了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这是一个最简单、最基本又是最容易被人们所忽视的事实：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绝大多数人是农民，他们世代代生养于兹，且辛苦耕耘于这块土地，正是中国的农村（土地上的房屋、河流与森林……）构成了一个永恒的存在。因此，不认识中国的农民和农村，不了解他们真实的生存状态，不懂得他

们的思想、感情，不知道他们的要求、愿望，不熟悉他们的文化，就很难说真正认识中国。

在我看来，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之所以这样“前赴后继”地走向农村，其内在的动因，就是要去寻求自己的生命之根。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在21世纪初，你们的“西部阳光行动”，青年志愿者运动，实质上也是一个“寻根”运动，是在补你们生命历程中不可或缺的一课：重新认识你脚下的土地。当你和这块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建立起了某种精神联系，成为你生命记忆中的永恒，以此作为你的生命底色，今后，你无论走向哪里，哪怕是远离故国、家乡，走到天涯海角，无论从事什么职业，你都是有根的，你都有一个精神的家园。

“你认识你脚下的土地吗？”这不只是中国年轻一代的问题，更是我自己的问题，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中国这块土地，中国普通人民的生存状态，正在发生书斋里很难想像的深刻变化，也面临着空前复杂而尖锐的问题，而我自己以及许多知识分子，对此却知之甚少，即使了解一些，也是失之笼统，更缺乏深切的体验。事实上我们对脚下的这块土地是越来越陌生了。现在许多人在谈论中国的学术危机、思想危机，在我看来，这或许是一个更带根本性的危机。当然，这些年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在关注中国的农村问题，而且有些学者还自觉地继承30年代“乡村建设运动”的传统，开始了新的实验。对这些学者，我是充满敬意的。“西部阳光行动”也得到了杨东平先生这样的教育专家的支持，当我听说他在今年暑期与你们一起奔走于各个实验点时，我是非常感动的。由于年龄以及其他一些原因，我不能直接参与你们的行动，但我愿做你们的鼓吹者、支持者，因为我深切地感受到了年轻一代的行动，对知识界、学术界、教育界的挑战意义。

这里，我要就对教育界的挑战再说几句。为准备这次讲话，我重读了《晏阳初文集》，注意到他说了一个事实：在3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南开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四所全国最著名的大学成立了一个“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晏阳初先生对此作了这样的评价：“现在有几个大学，他们也有决心打破传统的大学教育，走上乡村建设这条路上来……（这）可以说是中国大学教育史的新记录，大学教育的一大革命。乡村建设运动是伟大的事业，必须以大学为基础，方能巩固。大学教育能走到乡村建设的路上来，比办几次识字运动、几个民众教育馆，其意义重要不知多少倍。有了大学源源不绝地培养农建人才，这运动才会发扬光大。”他并且表示了这样的信心与希望：“我深信有了‘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也会引起全国大学教育改革的大运动。”坦白地说，看到晏阳初先生的这番讲话，我的思想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我想到当前中国的大学教育改革，包括我所在的北大的改革，甚至想到我自己所写的关于大学教育改革的文章，在所有的大学教育改革的设想与实践，乡村建设问题都没有进入我们的视野，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中国的大学应该担负“培养乡村建设人才”的重任，我们的大学教育——恐怕还不只是大学教育，而且包括中小学教育，我们的整个教育严重地脱

离了中国农村的实际,也就是脱离了中国最基本的国情,这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深刻的自省吗?从这一角度看,我以为同学们所组织的“农民之子”、“乡土中国研究会”、“教育知行社”等社团,以及你们所开展的“西部阳光活动”,对当下正在进行的大学教育改革是具有启示意义的,可以说你们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我希望有更多的响应者,引起更大的关注,而且能吸引更多老师特别是年轻教师的参与,或许有一天,中国的大学能够成为培养乡村建设人才的基地。这无论对乡村建设还是对大学教育本身,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三)

我再来谈“农村需要我们”。在当下中国,关于农村问题(人们通称为“三农”,即农民、农村、农业)的重要性与迫切性,人们已经谈得很多,我仍想简要地谈三点看法。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关键时刻所提出的关系全局的问题。对“文革”结束至今已进行了 20 多年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可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以经济为中心的各方面的建设事业,有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另一方面则是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城市与农村、东部与西部的发展极度不平衡,导致中国社会结构中出现大批的弱势群体,这是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其严重性在于:弱势群体的贫困,不仅是物质的贫困,更是思想、精神的贫困,权利的贫困;农民与下岗工人又占了弱势群体的主要部分。而农民与工人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社会发展作出了最大的贡献(农民工对城市建设的贡献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付出了最大的代价(中国企业改革以大批工人下岗为代价,这也是事实),但他们所得到的社会分配额最少,不能充分地享受改革开放与社会发展的成果。这就出现了严重的社会不公、社会不平等的现象,这也就关系到改革开放的道义性问题。

改革开放的道义性问题是根本性的问题。所谓中国的改革开放到了关键时刻,到了发展的十字路口,就是说,我们现在面临着两种发展的方向与可能:一是继续听任两极分化的蔓延,扩大富人与穷人的差别,城市与农村、东部与西部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其结果自然是灾难性的,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一是认真地、实实在在地而不是口头地、形式地,彻底地而不是表面地来解决两极分化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使改革开放有可能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而如何解决两极分化的问题,也有两种思路:一是重走“杀富济贫”的路,那就会形成历史的循环,这恐怕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当然,对用非法手段暴发致富,应依法追究,这并不是“杀富济贫”);一是国家从制度、政策上向弱势群体倾斜,扶植弱势群体的发展,扶植农村与西部地区的发展。农村建设问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

记得 30 年代农村建设运动的发动者曾提出过这样的命题:“农村改造就是